

# 刘兴祚事迹考

## 明清鼎革之际辽东汉人的政治取向

高志超 著



【渤海大学历史研究丛书】

长江出版社

刘兴祚事迹考

明清鼎革之际辽东汉人的政治取向

高志超 著

长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兴祚事迹考——明清鼎革之际辽东汉人的政治取向/

高志超著.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7-80708-910-0

I. ①刘… II. ①高… III. ①刘兴祚(? ~1630)—人物研究  
IV. 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1512号

刘兴祚事迹考——明清鼎革之际辽东汉人的政治取向 高志超 著

责任编辑: 陈辉

装帧设计: 刘斯佳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 编: 430010

E-mail: cjpub@vip.sina.com

电 话: (027)82927763(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80mm×1230mm 1/32

4.75 印张 15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08-910-0/K · 111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1
第二节 刘兴祚问题研究的必要性	3
第一章 要冲·贪吏·夷乱——晚明开原	6
第一节 交通枢纽 三面临夷——开原马市和夷策	6
第二节 民族融合 吏治腐败 ——辽东汉人民族意识的弱化	14
第三节 关于《刘将军事实》	16
第二章 姓名·国·家——刘兴祚的个人情况	21
第一节 刘兴祚·刘爱塔——两个名字的转化和含义	21
第二节 汉族·朝鲜族——刘兴祚的国籍和籍贯问题	25
第三节 生·死——刘兴祚生卒年考	29
第四节 婚姻·政治——刘兴祚的婚姻状况	32
第五节 爱国志士·乱世枭雄——刘氏兄弟	36
第三章 忠与叛——刘兴祚在后金的十三年	42
第一节 投奔·投降·被掠 ——刘兴祚进入后金方式的解读	42
第二节 民族·民众·理想 ——刘兴祚进入后金原因的归结	44
第三节 效忠·理想——刘兴祚在辽南的平乱和治民	47
第四节 内应·叛逃——刘兴祚投明的准备与选择	57

第五节 帝王·大臣·平民 ——刘兴祚同后金的各阶层的关系 .....	64
<b>第四章 民族·民众——刘兴祚最后的选择 .....</b>	<b>69</b>
第一节 阵前倒戈·被俘·假死 ——刘兴祚投明方式的争论 .....	69
第二节 民族·民众——刘兴祚投明的原因 .....	72
第三节 恩·怨——刘兴祚与袁崇焕、毛文龙的关系 .....	78
第四节 横行海上·号令东江——刘兴祚皮岛事迹 .....	90
第五节 彷徨·失望——刘兴祚之死 .....	93
<b>第五章 功过·是非——刘兴祚的评价 .....</b>	<b>96</b>
第一节 后金·明·朝鲜——评价概述 .....	96
第二节 静·变——刘兴祚在明清转型期的重要作用 .....	98
第三节 汉化·夷化——明清之际辽东汉人政治取向 .....	107
<b>注释 .....</b>	<b>111</b>
<b>参考文献 .....</b>	<b>133</b>
<b>刘兴祚生平大事记 .....</b>	<b>141</b>
<b>附表 .....</b>	<b>142</b>
<b>后记 .....</b>	<b>144</b>

## 绪 论

刘兴祚是明末清初东北地区著名战将,同时也是历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我们之所以说他极具传奇色彩,是因为他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刘兴祚初为明朝开原卫的一个下级官员<sup>[1]</sup>,后投奔努尔哈赤,在后金期间,刘兴祚因为努尔哈赤镇压辽东汉人的反抗,后又投入毛文龙帐下,重归明朝,展开抗击后金的行动。他的上述行为是封建王朝统治者和儒家道德伦理护卫者所不能允许的,所以在明清两朝的正史中均未留下其个人传记,仅在一些相关人物,诸如毛文龙、袁崇焕、库尔缠、达海等人的传记中有所涉及。因此,关于刘兴祚的事迹的文献史料,我们只能从正史中一些相关人物的传记、明清之际文人笔记,以及当时的档案中找到有关他的信息。鉴于关于刘兴祚的记载都很零散,这样就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疑问,加之学者们论述上的偏差,使刘兴祚更给人以扑朔迷离的感觉。

为弄清楚这位名噪一时的战将的历史真面目,以及刘兴祚所代表的明清之际辽东汉人的政治取向,从20世纪初开始就有学者对刘兴祚的问题的一些疑点进行分析,并提出各种看法<sup>[2]</sup>。但是这些文章中的许多观点,笔者认为尚有继续深入讨论的必要。

###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刘兴祚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不过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这一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并出现了一批值得重视的、较具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这对本课题研究具有重

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下面就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介绍。

关于刘兴祚问题,从已掌握的材料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专门论述刘兴祚的文章,主要的代表性成果有下面几篇。《清史论丛》第二辑孟森的《关于刘爱塔事迹的研究》以及商鸿逵就这篇文章所附的“赘言”,《清史研究》中郭成康和成崇德的《刘兴祚论》,姜守鹏的《刘兴祚事迹补考》,王佩环、王爱军的《刘兴祚兄弟事迹始末》,姜守鹏的《刘兴治的归明与叛明》。其二是曾在文章或著作中较多提到刘兴祚的文章,这方面主要的代表性成果有林铁钧和郭成康的《论袁崇焕的主和与斩帅》。其三是曾经提及刘兴祚的文章和著作,值得一提的主要有李成燕的《尚可喜之降与毛文龙之死》、仙俊岩和刘静妹的《新出土的涂鲁希墓碑及其墓葬》、张晓风和李波的《尚可喜与海城八蜡庙》、阎崇年的《满文的创制与价值》、姚念慈的《略论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的建立》、藤绍箴的《努尔哈赤评传》、关捷和李燕光主编的《满族通史》等。

在上述这些文章和著作中应重点分析一下孟森先生的《关于刘爱塔事迹的研究》、郭成康和成崇德两位先生的《刘兴祚论》、姜守鹏先生的《刘兴祚事迹补考》和《刘兴治的归明与叛明》,以及王佩环、王爱军两位先生的《刘兴祚兄弟事迹始末》等几篇文章。孟森先生的文章认为,刘兴祚的国籍是朝鲜,并认为刘兴祚到后金后最初的官职是“通事”。在该文的后半部分,孟老对刘兴祚以及刘氏兄弟的经历和作为做出了肯定的评价。郭成康和成崇德两位先生的文章较为全面地叙述了刘兴祚的生平情况,并对其予以高度的评价,但是对于一些需解决的问题却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例如刘兴祚的出生年代,由于史料短缺,他们只是一笔带过;对孟森先生认为刘兴祚是朝鲜人的说法,该文虽然表示怀疑,但却没有在正文中明确说明。至于商鸿逵先生的“赘言”则是对其先师观点漏洞的填补,不能独立看做一篇文章,且笔者认为这篇“赘言”中存在更多需要商榷之处。姜守鹏先生在《刘兴祚事

迹补考》一文中对孟森先生对刘兴祚为朝鲜人的论述进行了纠正,认为“孟森先生是把《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中的刘海(即刘牛)和我们所引《李朝实录·仁祖大王实录》中的刘海(即刘兴祚)视为一人了。其实两个刘海并非一人,即刘牛并非刘兴祚”<sup>[1]</sup>。关于刘兴祚“兴祚”一名的由来问题,姜守鹏先生仅称刘兴祚是其本来名字,爱塔之名是其进入建州之后的名字。对于刘兴祚进入后金的时间,则认为是在刘兴祚年少之时,至于其投入后金的原因则没有提出明确的结论。王佩环、王爱军的《刘兴祚兄弟事迹始末》一文可以说是当前学界对刘兴祚事迹研究较为全面、深入的成果,不过该文对许多问题,特别是对前人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没有进行探讨,且多采用沿而用之的方式,诸如刘兴祚的籍贯问题,仍采用孟森先生的观点。姜守鹏先生的《刘兴治的归明与叛明》一文主要是针对刘氏兄弟中刘兴治归明、叛明的过程、原因以及影响进行了有益的研究,而对刘兴祚其他兄弟的情况则没有太多涉及。

## 第二节 刘兴祚问题研究的必要性

目前,史学研究日趋细化,区域史、社会史、经济史等领域的研究日益成为史学界特别关注的对象。东北地方史研究在几代学者的努力之下,其成果已十分可观,并成为当前中国区域史研究的一块重要阵地。但我们亦应看到,尽管东北地方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的可喜成果,然而从现有的研究论著的内容来看,所涉领域略显狭窄,有些领域涉及者寥寥无几,特别是在人物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著名历史人物的探讨,对社会群体的考察却不多见。

刘兴祚是明清鼎革之际辽东汉人群体中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通过对他的考察可以使我们重新审视明清之际辽东汉人政治取向的整体趋势。刘兴祚的代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刘兴祚特殊的人生经历。关于这一点,本书将在后文中详



加论述。刘兴祚的这种人生经历并不是特定历史人物的个别性行为,而是明清之际辽东大部分汉人的共性特征,只不过在刘兴祚身上表现得更为彻底、显著。其二是以刘兴祚为代表的“辽东汉人”群体。这一群体的价值取向、政治倾向及具体作为深刻影响了17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的走向,其中许多代表人物,如刘兴祚、李永芳等人的历史抉择,引导着辽东汉人群体的整体走向。这些人的个体行为所反映出来的群体意识,对于重新认识清王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地获得汉族共同体认同这一现实,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刘兴祚在明清之际的辽南地区极得民心,其投奔后金和归明的行为曾经引起了辽东局势的巨大变动,也影响了后金(清)政权策略的转变。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对刘兴祚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有助于今人了解明末清初东北的政治环境对于时人的影响,更有助于人们从刘兴祚这个人的人生悲剧中愈加清楚地看到明王朝灭亡的原因。当然除了上述两点之外,笔者认为通过对刘兴祚的研究,还可发现许多值得后人深思的地方。例如,明末清初的辽东汉人,在其投奔后金以及后来的“反正”的过程中,民族意识觉醒是否是主要原因;明朝晚期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建州女真的蒸蒸日上的发展景象对辽东汉人这一群体在政治选择上起着怎样的作用,后人如何看待该问题,等等。

刘兴祚不仅是明清鼎革之际辽东大多数汉人政治取向的代表人物,单就该人物本身来说,亦十分重要。但正如前文所说,无论是在《明史》,还是在《清史稿》中,均没有刘兴祚个人传记,其他文献中关于刘兴祚的记载亦不多,且由于各类文献撰著者的观点、立场的不同,使得刘兴祚事迹在同一问题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记载,这就使刘兴祚这个人增加了更多一层的神秘色彩,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但是,史料的不足并不能掩盖刘兴祚历史地位的重要,我们通过对明清之际最具争议的代表性人物当中的毛文龙和袁崇焕的考察,可以更为深刻地认识刘兴祚历史地位的重

要,特别是在史料记述方面,明清时期的文人学者在评判这两个人物的过程中,多不约而同地将刘兴祚与其二人的关系,作为正面评述他们的依据。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有毛奇龄的《毛总戎墓志铭》和钱牧斋<sup>[4]</sup>的《也是园杂记》。毛奇龄<sup>[5]</sup>在《毛总戎墓志铭》中全面肯定了毛文龙在明清抗衡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并称刘兴祚投明完全为毛文龙之力,刘兴祚投明后亦完全向毛文龙效忠。钱牧斋在《也是园杂记》中则称刘兴祚投奔毛文龙实为不得已的选择,且毛文龙在向朝廷的塘报中称刘兴祚系其阵前捕获。该文献中还载,当刘兴祚到达皮岛后,对毛文龙的作为很不以为然。这里且不论《毛总戎墓志铭》、《也是园杂记》所记载内容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但将刘兴祚与毛文龙和袁崇焕间关系,作为评价二人历史功绩的重要砝码,足以见其历史地位的重要。

关于刘兴祚问题,史料方面存在着诸多限制,故在探讨以刘兴祚为代表的辽东汉人政治取向时,存在众多困难。为此,我们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不得不充分运用明清时期各方之史料,对刘兴祚有关事迹进行考证,去伪存真,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辽东汉人群体的政治取向。

## 第一章 要冲·贪吏·夷乱——晚明开原

在明代后期这一动乱的年代，居住在明辽东边境地带的辽东汉人群体由于长期受到辽东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人文风俗、民族关系、政治策略等因素的影响，在政治取向和政治选择方面均不大同于中原汉族群体<sup>[6]</sup>。开原是明王朝在东北地区的边陲重镇，至晚明时期，开原城的地位更显重要。这里不仅是边防要地，更是边贸都会，来自东北地区的各族群体，怀着各种不同的目的汇聚于此。开原<sup>[7]</sup>特殊的自然、社会环境成为我们考察明清鼎革之际辽东汉人政治取向的重要切入点。

### 第一节 交通枢纽 三面临夷——开原马市和夷策

明王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名义上包括北至苦允(库页岛)及以西的广大地区，但实际上，在不同时期，其有效统治范围并不一致。至明代后期，明政府在该区域的有效统治范围最北端在今天辽宁省的开原，开原、铁岭、抚顺、宽甸一线以东、以北地区并不在明王朝的掌控之下。在这一线以北、以东地区明王朝虽设立了不少卫所，但实际上并不完全受明政府的直接管辖。奇文瑛先生称：“明朝在东北，直接统治的地区，只是辽东都司辖区。”<sup>[8]</sup>也就是上述分界线的以西、以南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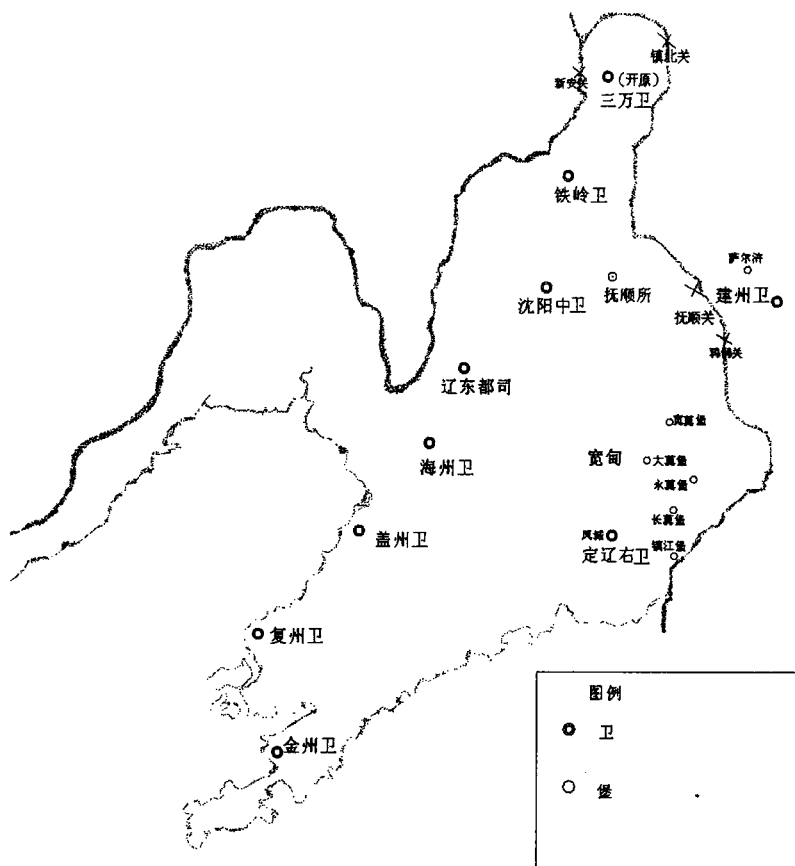
在这条防线以北地区，东北少数民族各部，为了获得与明朝进行互市的机会，多在名义上接受了明王朝的军事防御编制——卫所，故在这一地区分布着众多卫所。明茅瑞徵称：明政府“自开原东北至松花江以西，先后置建州、毛怜、塔山等卫一百八十四兀



近差异,故受汉文化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受汉文化影响较大的部族原来居住在松花江下游,后来一部分迁至图们江内外。公元1403年,建州女真在绥芬河上游设立建州卫,公元1412年,在会宁设建州左卫,此二卫先后迁到浑江流域。公元1442年,建州女真又从建州左卫分出建州右卫。后来,建州三卫皆徙至辽东山区苏子河流域定居。另一部分女真人溯松花江而上至大转弯处,这里史称海西,故称其为海西女真。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兀狄哈”,被称为“野人”女真。这就是明代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的分布情况。分布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野人”女真以狩猎捕鱼采集为生,生活在松花江流域的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由于汉化程度深,他们多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同时靠通过同明朝进行贸易发展壮大自己,从而使自己在竞争中取得优势。明太宗朱棣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在东北设立奴尔干都司,并在其下设立数百个卫所,开原就是这些卫所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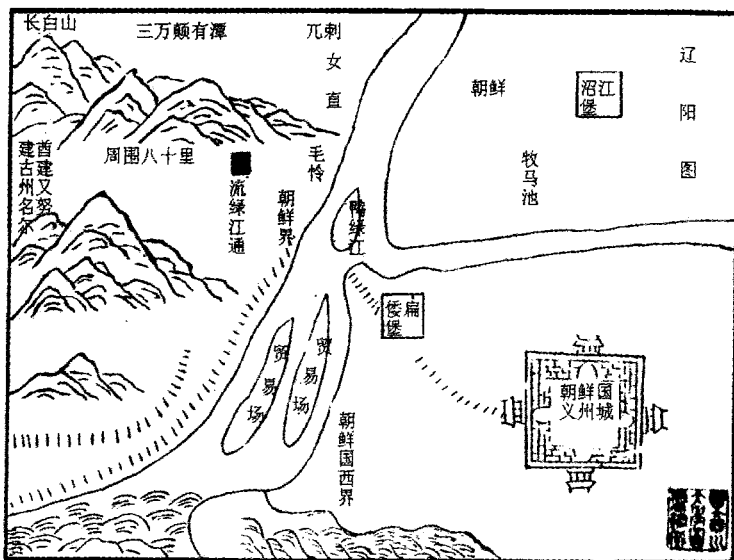
开原原名“开元”,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改元为原”<sup>[10]</sup>,它是当时明王朝设在辽东实际辖区最北端同东北各部贸易的场所,亦即下图(图二)中所示的三万卫<sup>[11]</sup>。明末清初的开原,是一个极具特色的辽东重镇,按蒋秀松、李治亭等人在《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一书中记载开原在当时的情况是,明代“开原是一座大城,周长达二十三里,城内居民很多,颇为富足。明朝在这里设马市,成为东北各民族交往的中心之一”<sup>[12]</sup>。明季开原城的城市规模在当时辽东各“镇”之中属较大者,加之其为东北各族贸易中心之一,越发突显其地位之重要。《明史》记载,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设辽东开原、广宁马市”<sup>[13]</sup>。也就是说,早在明代初期,开原便设立了边境贸易的马市,并且其在各地马市中的地位尤重。明朝初年在东北地区设立三处马市,而开原独占其二。《辽东志》载:“一于开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直;一于开原城东;一于广宁以待朵颜三卫,各去城四十里。”<sup>[14]</sup>开原马市的设置,一方面促进了东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多民族的商贸活动

使开原的商业氛围不断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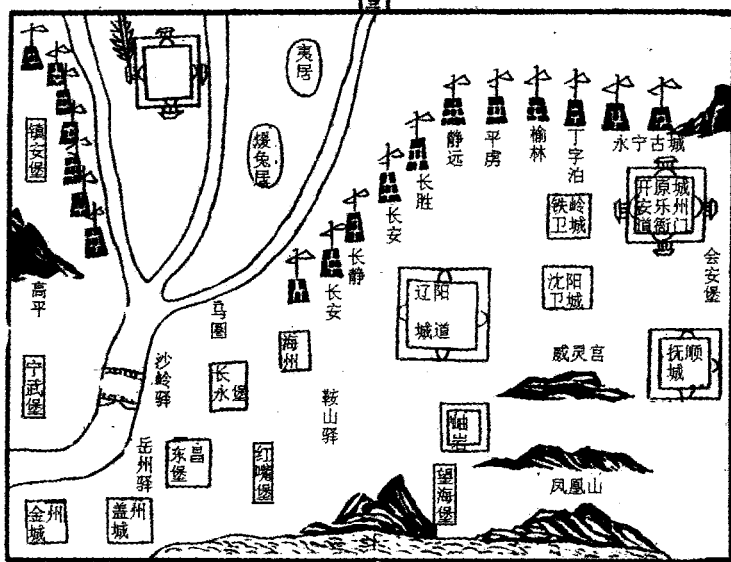


图二

开原不仅是辽东地区重要的贸易中心,更为重要的是开原地处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当时辽东通往东北各地区共有六条交通干线,开原城是六条干线的起点<sup>[15]</sup>。广西都司都督任礼称:“辽东开原之地,控制胡虏。”<sup>[16]</sup>其东、西、北三面皆居住着少数民族,其西北为蒙古兀良哈,东北是建州女真的左右卫,东南为女真的建州卫,其北部、西部分布着海西女真各部(图三、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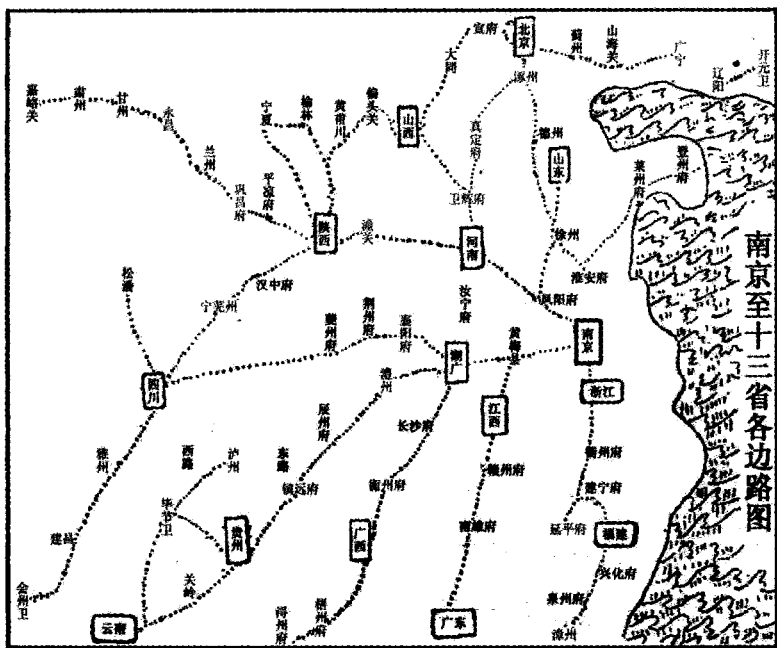


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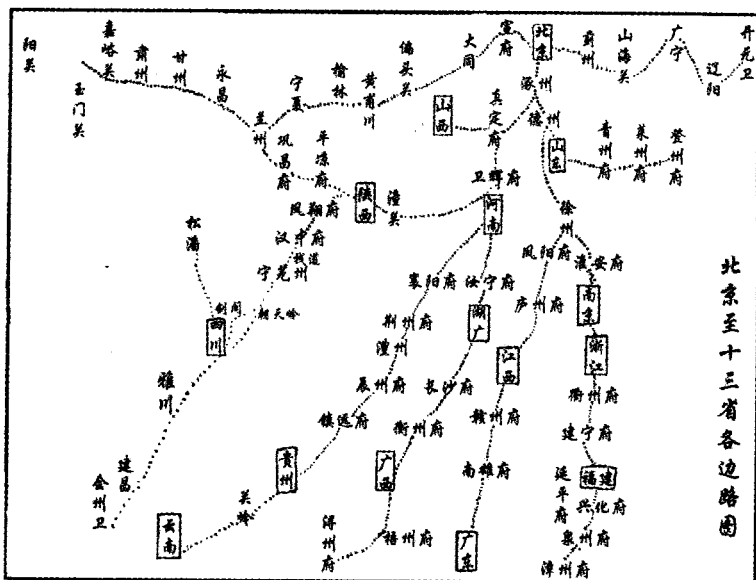
图四

据《辽东志》和《全辽志》所记载的边外驿路，均是以开原为出发点：如出开原往南，有经“开原东陆路至朝鲜后门”的道路；往东，有经“纳丹府东北陆路”到达建州、毛怜女真地区的道路；往东北，有经“开原北陆路”和“海西东水路城站”、“狗站”，到海西女真及直达黑龙江下游地区的道路；往北有经“海西西陆路”，伸向嫩江和江西岸蒙古地区的道路<sup>[17]</sup>。故开原为明王朝在东北地区最为重要的关卡，而在这里设立的卫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图五、图六）。



图五





图六

明王朝在东北地区设立卫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羁縻该地区各民族,从而稳定、巩固边疆。由于明初采取的合理政策,在开原外围不仅东北各族安于生产,且东北各少数民族“有愿降中国者,于开原设安乐州……居之”<sup>[18]</sup>。《辽纪》记载,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时女直达纳款甚众,乃建安乐、自在二州于开原城处之”<sup>[19]</sup>。换句话说,开原是当时东北少数民族和汉族合法聚集之地。开原除了是各族民众聚居之所外,明廷还在此设立关口。正如图(图六)所示,开原东西两侧各有一个明王朝针对东北少数民族而设立的贸易关口“新安关”和“镇北关”,居住在开原的各族人民主要靠双边贸易生活,贸易成了各族人民生存的源泉,同时也是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壮大自身势力的根源。为此,各族纷纷竞相争夺同明朝的贸易权力。明初诸帝大多数能够采取合理的政策保证各族稳定,尽量满足各族需求。同时因明前期中央